

被革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史丛书

教育

郑谦

著

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领域是一个特殊的、敏感的、各种矛盾集中的领域。
正因为如此通过教育革命这个特殊的角度，比较容易接近和发现“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基本规律。

101690

G529.7
2

被革命

的

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史丛书

郑谦

中国青年出版社

著

「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革命”的教育：“教育革命”始末/郑谦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1

ISBN 7-5006-3221-5

I. 被… II. 郑… III. 教育改革-历史-中国 IV. G52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7124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河北省遵化市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2.75 印张 2 插页 280 千字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定价:20.00 元

07-167

“现在，教育在全世界的发展正倾向先于经济的发展，这在人类历史上大概还是第一次。现存教育在历史上第一次为一个尚未存在的社会培养着新人。”

30年前，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题为《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编者按语中，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段“最新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自此，“文化大革命”中已在进行的教育革命很快进入了高潮。

1975年9月26日，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以一种沉重的心情忧虑地说道：“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邓小平说这话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九年，而作为这场“革命”重要内容之一的、在当时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革命”，也已进行了近八年。激进的“革命”与严重的危机，高尚的理想与令人沮丧的现实，疯狂的破坏与顽强的抗争，交织成一幅令人眼花缭乱的画面。

现在40岁~50岁左右的中年人，大多数都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程度上被卷入了这场教育革命，有的是在小学，有的是在中学，有的是在大学，有的是在中学——甚至小学——毕业后就成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的则成为工农兵学员。

时至今日，在他们中间，有的对当年那段历史已经淡忘，有的却仍然刻骨铭心，有的不时叹息自己人生中的宝贵年华被盲目地虚掷在那样一场史无前例的动乱之中，因而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希望通过他们实现自己未了的“求学梦”、“大学梦”，有的在逆境中自强不息，终于学有所成，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改革、建设骨干力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这场“革命”的更年轻的一代来说，要他们理解这段历史，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一个1996年毕业的研究生，偶尔在电视记录片中看到有关“文化大革命”中学校镜头时，竟不由自主地说：我要是赶上那个时候就好了。当被问及原因时，他毫不犹豫地，说：那就可以不要考试了。这个研究生的话无意中接触到一个现在对于绝大多数学生、学生家长和教师来说都是极为敏感的话题，因为他们虽然都被难以忍受的应试教育压得喘不过气来，但却又显得那样的顺从和无奈。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领域是一个特殊的、敏感的、各种矛盾集中的领域。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出自于大学。“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批造反派出自于学校。而且，正是由于这些青年学生冲向社会，推动了整个社会的“造反”浪潮。1972年周恩来领导的整顿中，广大师生的反应特别强烈，教育领域也很快出现了一个短暂的、令人鼓舞的春天。随之而来的“四人帮”的反扑，突破口就选在教育领域。在1975年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中，教育界的整顿虽后起但却一鸣惊人，一下子便在理论和实践等方面击中了“四人帮”的要害之处，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重点。1975年底“四人帮”掀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教育领域再次成为他们首选的突破口……正因为如此，通过教育革命这个特殊的角度，比较容易接近和发现“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基本规律。

本书不是一本有关教育学或教育史的专著,而只是想通过对“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革命的描述和解释,对当时我国的教育工作以及由此反映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提供一些分析的结果和角度。

目 录

上 篇 “教育要革命”

第一章	从“杀向社会”到“复课闹革命”.....	(3)
第二章	教育改革大潮:世界与中国.....	(24)
第三章	单调肃杀的“百花”	(42)
第四章	招生改革:一个关于平等的虚幻神话.....	(64)
第五章	受“再教育”的老师和当“主人”的学生	(94)
第六章	大开校门的学校.....	(133)
第七章	教劳结合还是以劳代教.....	(147)
第八章	课程 教材 教法 学制.....	(165)
第九章	领导体制与学生组织.....	(191)
第十章	与教育质量下降并行的教育普及.....	(204)
第十一章	教育革命中的耀眼新星.....	(214)
第十二章	教育革命深层的社会思潮.....	(233)
第十三章	教育革命的终结.....	(256)

下 篇 整顿与“反复旧”

第十四章	教育整顿 如沐春风.....	(271)
第十五章	从整顿到“批林批孔”的过渡.....	(298)
第十六章	“批林批孔”:“政治”与“教育”的畸形结合 ...	(318)
第十七章	义无反顾 再次整顿.....	(352)

第十八章	慷慨激昂批极左 放手一搏倡整顿·····	(362)
第十九章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386)
结 语	·····	(398)

上 篇 “教育要革命”

第一章 从“杀向社会”到“复课闹革命”

1966年5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召开及会议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标志着“左”倾错误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此正式全面展开。^①

1966年5月7日，“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前夕，毛泽东就林彪报送的一份材料给他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信中提出：

“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

“同样，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同月15日，党中央在转发这封信时指出，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

同年8月1日，《人民日报》在题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9周年》的社论中进一步指出：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认识的深入，人们认识到，“五七”指示的确是一个重要的纲领性文件。这个写成于“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的指示，实际上已经勾勒出了“天下大乱”之后所要建立的那个理想社会的蓝图，而这个蓝图中的某些重要内容，我们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已经有所领略——这在教育领域似乎尤其突出。

毛泽东很早就看到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并立即对它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虽然这种改革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但这并没影响他对苏联体制日益增加的不满。他敏锐地感觉到了现

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深刻内在矛盾和危机,世界范围内 60 年代的左翼思潮、反战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更使他对自已的判断坚信不疑。从一种传统的、甚至是一种战时的社会主义观出发,他对当时已经出现的社会主义改革高潮充满疑虑,认为它们已经放弃了公有制和劳动者的主体地位,鼓吹“物质刺激”和个人利益,丧失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道德,因而是修正主义的。他希望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来回应所遇到的挑战。除了“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主要任务外,他还迫切地希望通过“文化大革命”推进他所憧憬的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加速消灭三大差别,建设纯洁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培养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能力的社会主义新人……毛泽东的确看到了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也是难以避免的——许多消极的、阴暗的方面,并力图在落后的基础上向它们宣战,他的悲剧在于他用以反对现代化弊端的方法往往是前现代化的。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目标与教育领域联系的密切程度超出了其他各个领域,或者说,教育领域集中地、综合地体现了这些目标的内容和方向。

这个蓝图包含着深刻的矛盾,仅用“是”或“否”、“对”和“错”等简单的标准无法对它进行概括和评述。这里既有极为现实的考虑,又有不切实际的空想;既有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热烈憧憬和强烈的超前意识,又有对以往经验的过分依恋和简单回复;既有科学的预见,又有错误的设想;它既使人们振奋鼓舞,又使他们(主要是其中的知识分子)沮丧寒心……前进与后退、理想与空想、超前与滞后、经验与教条等等如此水乳交融般地统一在一个整体之中,使得许多喜欢简单、明快地看待问题的学者长期为对它的评价争论不休。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五七指示”对教育领域的影响超

过了其他任何领域。教育革命中的一切试验和举措中，几乎都可以看到它或明或暗、或大或小的影响；在这个领域中反复斗争着的极左思潮与健康力量，都可以从中找到各自的理论依据甚至理想目标。

二

1966年6月1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篇大字报，并发表了题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在此后短短的几天里，在全国范围内，千百万敏感、富于激情而又缺少经验的大学、中学及一部分高小学生便狂热地行动起来。他们在校内议论、开会、辩论，张贴大字报，批判干部和教师，开始成立各种群众组织，学校中各级行政领导及党团组织逐渐失去权威，学校中的混乱与日俱增，实际上已处于停课“闹革命”的状态。

6月24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在他们那篇著名的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一文中宣布：

“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

“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厮杀。什么‘人情’呀，什么‘全面’呀，都滚一边去！”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过分了吗？老实说你们所谓不过分，就是改良主义，就是‘和平过渡’。这是妄想！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革命者就是孙猴子，金箍棒厉害得很，神通广大得很，法力

无边得很……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②

自6月中旬起，中央陆续向北京一些大专院校、中学派出工作组，代替受到运动冲击的学校行政、党团组织领导运动，但这又很快引发了新的矛盾并引起中央文革小组的不满，认为它束缚、阻碍了学生运动。

7月中旬，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后，在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后，对工作组和派工作组的方式进行了严厉地批评。7月29日，北京市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宣布撤销全部工作组，并宣布大中学校放假半年闹革命。工作组撤出后，学校中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分歧和分裂进一步发展，各派之间的对立情绪愈演愈烈。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在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复信中，表示“热烈的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这一消息立刻在广大青少年学生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短短的几天里，北京中等学校、高等学校纷纷建立起冠以“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等各种名称的红卫兵组织。紧接着，全国各地纷纷效仿，红卫兵组织成为青少年学生中——特别是那些出身“红五类”的青少年学生中——最革命、最高贵、最“敢打敢冲”、最令人羡慕的组织。对于这些宣言“让我们像勇敢的海燕一样在这场大风暴中翱翔吧”，“让革命的大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的一代骄子来说，校园已经显得越来越小和乏味了。

三

1966年8月，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在这个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第十条即为“教学改革”。其具体内容为：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在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等先后八次接见到北京进行“革命大串连”红卫兵、学生和教师，人数达1100万之巨。在其中几次接见中，林彪在讲话中对红卫兵的行为大加赞扬。他说：“我们坚决地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大立无产阶级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其他革命的青少年组

织，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在这类言论的鼓动下，各地红卫兵潮水般地冲向社会，“横扫四旧”。他们走上街头，张贴标语、大字报，散发传单，更改街名、店名、学校名，围剿“奇装异服”，进而擅自抄家抓人，游街批斗，甚至私设公堂，滥施酷刑，直至倡议修改宪法，废除国歌。他们“要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红卫兵是帝国主义……死刑的执行者，是旧世界的掘墓人。”他们号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的新一代，全世界革命的新一代，起来造反吧！”^③

从八月上旬《十六条》通过、发布到九月上旬，刚刚在《十六条》中被明确列为“文化大革命”主要任务的“教学改革”便被“破四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大串连”等更为重要的任务冲击得不见踪影。在“师生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④的号召下，昔日生气勃勃的校园里几乎空无一人。与冷冷清清的学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社会上，在冲击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批斗“走资派”的“战斗”中，在狂热的派性对立里，在“扫四旧”、“大串连”的浪潮中，却处处可以看见这些青少年学生的身影。“文化大革命”已经有了更为重要的任务和目标，“教学改革”暂且被放到了一边。

四

“文化大革命”是以青少年学生为先锋发动起来的。当学生们走出校门、冲向社会时，整个社会的动乱局面随之形成。当动乱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和范围而必须对它加以某种限制时，约束